

专栏导语：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

张海波*

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知识生产，以实现对现象世界的认识。自1970年代起，社会科学就已经开始试图认知并描述19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现象世界的内在变化，“增长的极限”“寂静的春天”“历史的终结”“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这些概念框架都属此例；尤其是“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明确地表述了这一变化的内在属性。根据“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者、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92）的理解，现代化既是生产力指数式增长的过程，也是风险制造的过程，风险的制造是生产力指数式增长的负面后果，一旦这些负面后果超过了生产力增长的收益，风险就会取代增长而成为历史发展的主导逻辑，工业社会也就按照自身逻辑发展到了风险社会阶段。风险社会理论的另一代表人物、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2000）则认为，风险社会来临的标志是内部风险（Internal Risk）超越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而占据主导地位。无论采取哪一种标准来看，风险社会都已然来临。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传统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主要面向工业社会。这是因为，传统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是分学科的，而学科多产生于工业社会，它们本质上都是对工业社会现象世界的认知，是工业社会现实问题的知识映射。例如，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心理学则产生于19世纪末期，管理学、政治科学则都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

更为关键的是，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之所以区别于哲学和人文学科而成为“科学”，还在于它在方法论上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物理学）的借鉴。例如，“社会学”这一学科最初的名称就是“社会物理学”。在牛顿物理学看来，世界是有序的，自然科学只研究物质世界的有序性；与之相应，社会科学也只关注了社会世界的有序性。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知识生产多研究有序的

* 张海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常态现象，而极少关注失序的非常态现象；传统的社会科学多研究发展问题，而极少研究风险问题。然而，在风险社会，有序的常态现象减少，失序的非常态现象增多，且有序与失序之间的转换加速。常规的知识对我们经历灾难通常用“百年一遇”等字眼“一言以蔽之”，但这并不能缓解公众的安全焦虑，因为这些知识并不能帮助他们有效地理解和应对风险社会。因此，从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来看，仅凭工业社会的知识体系，已经难以满足风险社会中人类认识现象世界的需要，我们急需发展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

伴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对于失序的非常态现象，传统的社会学科在知识生产上已经做出了一些回应，我们也已经认识到这些知识对于解释风险社会现象世界的重要性，对这些知识的需求也日益强烈。这些知识在不同的传统学科中几乎同时产生，这显然并不是巧合，而是传统的社会科学知识对风险社会的不约而同的反应。就其主体而言，这些知识沿着下列核心概念展开。

(1) 风险 (Risk)。关于风险的知识主要散落于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在经济学领域，虽然保险的实践最早可以追溯至 14 世纪的海上保险，但保险学的大规模学科化却是在 1970 年代。进入 1980 年代以后，股票市场的动荡激发了关于金融风险的研究，催生了行为金融学等新的知识体系。大约与此同时，心理学关于风险感知的重要研究也得到了飞跃发展，并在公共政策中得以广泛应用。在社会学领域，贝克、吉登斯和拉什 (Scott Lash) 等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使得风险语义甚至超越了经济语义 (Beck, 1992; Giddens, 1990; Lash, 1993)。卢曼 (Niklas Luhmann) (Luhmann, 1993) 对风险的系统分析也提供了对风险与现代性关系的深刻洞察。

(2) 灾害 (Disaster)。美苏“冷战”的核战争阴影直接激发了灾害社会学，关注核阴影下的集体行动，这是芝加哥学派集体行动研究对风险社会的初次回应，也被称为灾害研究的人类行为学派。克兰特利 (Enrico Quarantelli) (Quarantelli, 1966) 和戴利斯 (Russel Dynes) (Dynes, 1970) 开始探索经典组织理论无法解释的灾害情境下的有组织行为。与此同时，地理学的灾害研究也发生了重大转向，美国学者怀特 (Gilbert White) (White, 1945) 的博士论文《人类对洪水的适应》(Human Adjustment to Floods) 将地理学的灾害研究引向人类自身，这也被称为灾害研究的人类生态学派。紧随其后，灾害社会学的发展催生了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领域的应急管理研究，开始解释灾害情境下的政府结构及其合作行为。

(3) 危机 (Crisis)。在政治学领域，美国政治学者赫尔曼 (Charles Hermann) (Hermann, 1969) 在 1960 年代将危机作为学术概念引入国际冲突研究。到

1980年代,政治学者罗森塔尔(Uriel Rosenthal)(Rosenthal, 1989)等扩展了赫尔曼对危机的定义,将“慢性危机”(Creeping Crisis)也纳入研究范畴,与“急性危机”(Instant Crisis)相对,使得对危机的理解跳出决策论的狭窄界定而成为广义的管理学议题,“三里岛核泄漏”“挑战者号爆炸”等一系列现象事件的发生也激发了管理学对危机的研究。作为政治传播的延伸,传播学中出现了危机传播的研究。

(4) 安全。中文的“安全”在英文中有两个对应的概念:一是Security,主要指由于主观原因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国学者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Wolfers, 1952)发表的论文《“国家安全”:一个含糊的符号》(“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开启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安全研究。在“冷战”结束后,安全研究又衍生出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研究。二是Safety,主要是指由于客观原因引发的安全问题。这种意义上的安全主要出现于安全科学的语境中,指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防护,本身就是工业化风险的对冲机制,“职业安全”(Occupational Safety,为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的简称)、“公共安全”(Public Safety,为Public Safety and Health的简称)这两个概念也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应用。

1950年代以后,伴随着对风险社会的认识深化,这些知识也开始在分支学科中逐步发展;时至今日,这些知识都有成为“显学”之势。究其原因,还在于随着风险社会的不断演进,现象世界的失序开始增多,对理解和应对失序的知识需求也就自然“水涨船高”。

由于有序和失序是连续的,因此关于有序的知识对于理解失序也有帮助。这就意味着,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也不能完全脱离工业社会的知识生产,而是需要与工业社会的知识生产贯通起来。这也是风险社会的准确涵义,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风险社会向前包含了工业社会。

与此同时,对于牛顿物理学的还原论(Reductionism)的反思也开始发展,先是系统论出现,批判将整体还原成部分的方法论,强调从整体来认识现象世界;随后是复杂性理论,强调总体的涌现(从部分中生成总体)。这也为社会科学提供了里程碑式的启示,站在这一方法论立场来看,工业社会中社会科学生产的知识是分支性知识。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社会则是整体性社会,不仅风险社会是整体性社会,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也是连续的,而非离散的。因此,如果还是一味固守还原论的方法论立场,知识生产就会越来越远离现象世界,也就越容易沦为知识生产者的“文字游戏”“模型游戏”或是“发表游戏”。

以上分别谈到的其实就是关于知识生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根据这两个维

度进行划分，我们可以将知识生产初步分为四种类型，见图1。

(1) 用还原论来描述、解释和预测工业社会的现象世界，可以产生关于有序的分支性知识（简称“有序分支性知识”）。

(2) 用还原论来描述、解释和预测风险社会的现象世界，可以产生关于无序的分支性知识（简称“无序分支性知识”）。

(3) 用涌现论来描述、解释和预测工业社会的现象世界，可以产生关于有序的整体性知识（简称“有序整体性知识”）。

(4) 用涌现论来描述、解释和预测风险社会的现象世界，可以产生关于无序的整体性知识（简称“无序整体性知识”）。

本体论	有序分支性知识	有序整体性知识
	无序分支性知识	无序整体性知识

认识论

图1 知识生产的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我们发展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需要无序整体性知识，它对风险社会有更好的解释力。这也是我们在南京大学推动风险、灾害、危机、安全多学科研究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知识已经失去价值；恰恰相反，另外三种知识的发展也有利于无序整体性知识的生产。例如，由于无序整体性知识可以来自于无序分支性知识的涌现，因此无序分支性知识越发展，无序整体性知识也可能越发展。又如，由于有序和无序是连续迭代转换的，因此有序分支性知识有助于理解无序分支性知识。同理，由于有序和无序的连续迭代转换，有序整体性知识也有助于理解无序整体性知识。

写论文就是生产知识。从上述的观点来看，这组专栏的五篇文章都可视为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都应该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风险社会的理解。

黄策、邓燕华的论文《突发性责任事故的信息搜集与披露——基于央地信息沟通的视角》运用博弈论模型对突发事件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在信息的搜集和披露上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由于博弈论可以为个体间的关系提供确定性的分析，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行动逻辑，以及这些行动逻辑所产生的后果，这就为理解突发事件条件下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提供了明确的视角。在结论上，作者认为，对地方隐瞒信息的惩罚，并非越大越好，而应找到一个合适的区间。这可能是正确的，富有启发且有现实意义。

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知识体系中，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已经是基本共识。

用博弈论来分析突发事件情境下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非常值得赞赏，这可以为失序状态下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提供分析方法和理解路径。从这一点来看，这篇论文可以结合中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情境，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有所发展：

第一，中国对突发事件实行分类管理，将突发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类，涉及的管理部门也并不相同。那么，在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中，中央和地方关系是否会有所不同？从经验上看，中央和地方在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中的博弈可能会有所不同。

第二，中国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分为预防与准备、预警与监测、救援与处置、善后与恢复四个时期，在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的角色可能不同，因而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也可能有所不同。

第三，中央和地方仍然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在现实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中央往往是指具体的部门，比如安监总局、环保局、民政部等，而地方则有党委和政府的差异，应急管理的责任主体是政府，但实际的决策主体却是党委。而且，具体的突发事件往往都不是单一事件，都是所谓的“系统风险”（Systemic Risk）或“跨界危机”（Transboundary Crisis），涉及的部门往往不止一个，因此，中央和地方都不是整体，中央的部门间、地方的党委和政府间往往也存在博弈关系，实际的情形可能更为复杂。虽然博弈论是一种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需要进行一些条件限定，但仍然可以尝试进入中央和地方内部进行更为精细的分析。

陈玲、李利利的论文《政府决策与邻避运动：公共项目决策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触发机制及改进方向》运用单一案例研究方法，通过构建的三阶段的分析框架，对“邻避”项目决策中的政府角色进行了全过程分析。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项目为对象不同的是，这篇文章聚焦了政府在“邻避”项目中的角色，这是这篇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作者识别了这一项目决策过程中的风险。这些结论无疑具有较强的政策应用价值。从常态向非常态的转化来看，政府为应对非常态的努力实际上只能脱胎于常态治理，因此如何将政府为应对非常态的努力嵌入常态治理中是现实操作的难点。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看到了问题。后续的研究则可以尝试如何解决问题，尤其是风险沟通的问题。

陶鹏的论文《灾害批示与公共组织学习演进机制：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为例》，以安全生产的多起案例为资料，将灾害批示与组织学习联系起来，非常有新意。灾害批示是中国的制度情境中比较特殊的行政沟通方式，尤为值得关注。

在该文的基础上，从灾害批示到组织学习的逻辑链条中还可以包括如下问题：第一，灾害批示本身是否存在差异？灾害初期的批示和灾害后期的批示的作用是否相同？第二，是否所有的灾害批示都能促进组织学习？如果不是，为什么有的灾害批示能够促进组织学习，而有的灾害批示不能促进组织学习？从经验来看，由于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执行，并非所有的灾害批示都能促进组织学习。第三，促进组织学习的因素还包括组织的自我学习，即组织自身也可以根据信息的反馈来进行自我学习，影响组织学习的因素还包括组织变革的路径依赖等，灾害批示如何与这些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动组织学习？总体来看，从灾害批示到组织学习的逻辑链条还比较长，深入的单一案例研究可以提供更多的细节，尤其是从灾害批示到组织学习的完整的逻辑过程。

蔡长昆的论文《自然灾害治理过程中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差异》一文以社会资本为概念工具，将灾后的社会资本与灾前的社会资本贯通起来，而灾前的社会资本又嵌入了“政治—社会”制度结构。作者选择了四个案例，这四个案例分别对应四种具有不同结构性特征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的这种结构性特征又源于“政治—社会”制度结构的差异。这是值得赞赏之处。实际上，非常态是常态的延续，从行动主体来看，灾害的行动主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行动主体，灾前就被赋予灾害响应职责的；二是突生的行动主体，灾前虽未被赋予灾害响应的职责，但也参与了灾后响应。在实际的灾后响应中，往往是二者兼有、混合出现。而且，无论是强制的行动主体，还是突生的行动主体，也都是被灾前的“政治—社会”制度结构所决定的。这种分析思路对应急管理研究至关重要，不仅实践如此，理论研究也是如此。研究源于对实践的观察，没有实践也就无法观察，因此实践结构也潜在地决定了知识生产。在这种意义上，文中有些观点仍然值得商榷，例如，文章认为美国的灾害研究缺乏对社会维度的关注，这与美国灾害响应的实践结构不符。即便从文献来看，美国的灾害社会学研究要早于应急管理研究，也就是说，美国灾害研究对社会维度的关注要早于对政治和行政维度的关注。

肖群鹰、朱正威、刘慧君的论文《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非干预在线评估模式研究》一文的切入视角和研究内容都非常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该文针对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存在的失真与失灵问题，建构了非干预在线评估模型，并以广东江门鹤山反核事件为例，基于新浪微博大数据平台收集互联网数据，进行模型检验，提出一种线下线上社会稳定风险综合评估模式。这种取向的研究亟待发展。1980年代，斯洛维克（Paul Slovic）（Slovic, 1987）关于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的研究在公共政策的相关议题中得到了巨大的应

用。今天，中国基于互联网的风险感知和风险表达也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同的是，在一个开放的政治体系中，分散的、个体化的风险感知可以通过投票来影响公共政策；而在今天中国的制度情境中，由于政治体系相对封闭，互联网成为公众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兴起也使得分散的、个体化的风险感知可以形成集中的、集体化的表达，形成一种结构性力量，从而推动公共政策变革，这是中国现象的独特之处，亟待我们在知识生产上予以回应。

这五篇论文虽然各有特点，但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所身处的风险社会的种种景象。从论文写作的角度看，这五篇论文都是符合学术规范的，选题新颖，设计严谨，资料扎实，结论可靠，且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五篇论文既有有序分支性知识，也有无序分支性知识，也有有序分支性知识向无序分支性知识的转化。

每一种知识生产都是有价值的。如何与风险共生？这是风险社会的核心命题。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肩负起这样的职责，发展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我们期待更多的高质量的研究，也期待更多的研究者投身于此。

参考文献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Dynes, R. (1970). *Organized Behavior in Disaster*. Health LexingtonBooks.
- Giddens, A. (2000).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Routledge Press.
- Hermann, C. (1969). *Crises in Foreign Policy: A Simulation Analysis*. Indianapolis: Bobbs Merrill
- Lash, S. (1993).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0(1): 1 – 23.
- Luhmann, N. (1993).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 Walter de Gruyter & Co.
- Quarantelli, E. (1966). *Organization under Stress*. Disaster Research Center,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 Rosenthal, U. , Michael, C. T. & t' Hart, P. (1989). *Coping with Crises: 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 Riots, and Terrorism*. Springfield, Charles C. Thomas
- Slovic, P. (1987). Perception of Risk. *Science*, 236. 4799: 280 – 285.
- White, G. (1945). *Human Adjustment to Flood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olfers, A. (1952).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7 (4): 481 – 502.